走进决策者

时代呼唤着一大群新颖的领导者，我们的党在努力地造就培养着，我们的人民在热切地期望着。他们应该是怎样的一些人物呢？他们应该是懂国情、有宏略、勇创新、善从实际出发的实干家，应该是察民情、顺民心，忠于“三个代表”的人民公仆，应该是执著追求未来，引导时代前进的开拓者。我们已经有了一大批这样的干部，这是我们今天国力鼎盛，人民富裕的根本保证。温州的成功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到过温州的人都知道，那是地处浙江东南沿海，一面临海,三面环山,居住着 700 多万语言难懂的温州人。刚改革开放时，那里的社会、经济十分落后与贫困，群众形象地把这里称为“四线”,即 50 年代是“前线”(温州临近台湾，地处前线)、60 年代是“火线”(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武斗，炮火连天)、70 年代是“短线”(粉碎“四人帮”之初因洋跃进而缩短战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温州才有了“起跑线”。温州人民面对温州人多地少(680 万人口，人均耕地仅有 0.41 亩）；国家投入少（由于前线,过去 30 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 5.95 亿元，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1/7)，可利用资源少（地下没有资源，又无大城市依托，交通不便），集体经济薄弱(1957 年前温州工农业总产值仅 18.6 亿元）的实际，温州的决策者领导全市人民用足、用活、用好了党的富民政策，坚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我改革、自求发展、自担风险、自我建设”的“四自”方针，走了一条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民营经济为主要形式，以资金市场为动力，以劳动力市场为骨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但对于大多数人，恐怕只从满天飞的十万供销大军中，从报纸的广告栏与责骂声中感到温州走私猖獗，物价高涨、治安混乱、迷信泛滥，人往铜钿眼里钻，“要看资本主义到温州”、“温州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所以每当报纸上披露一件违法乱纪或假冒诈骗的案子,人们会见多不怪地说:“又是温州”;“总是温州!”,把十万大军称之为“十万细菌”;“温州”成了“瘟州”。

但温州的领导和老百姓坚信，自己走的路没有错：“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你争你的,我干我的,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十二年来大量的实实在在的数字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2000年温州市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单位：亿元

项　目	完成数	比上年±%
国内生产总值	825	12.7
全市工业总产值	1806	14.6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600	25.4
农业总产值	94	2.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65	13.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4	5.6
财政总收入	73.9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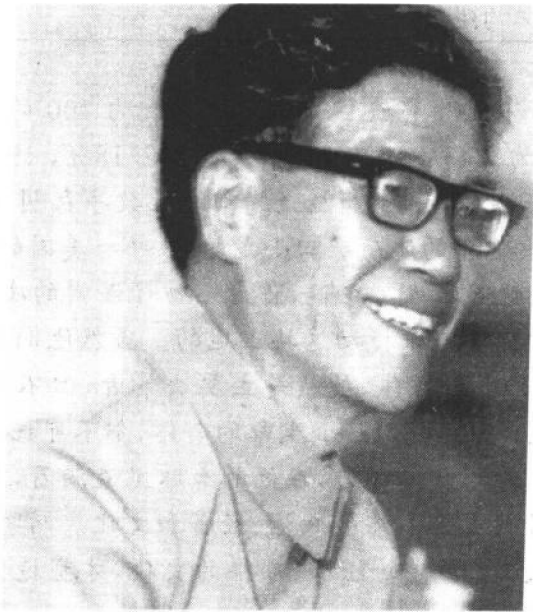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44	31.5
金融存款余额	918	20.9
金融贷款余额	590	29.5
外贸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20	63.1
其中出口总额（亿美元）	15	82.3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11500	11.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4296	6.8

如果以温州 1978 年的 GDP 指数为 100 的话，那么 1985 年为 245.8%，1990 年为 378.18%，1996 年为 1474.0%，2000 年为 2422.2%。统计数字表明温州改革开放后的 22 年的速度＝四小龙的 38 年＝美国的 116 年。

为破解温州发展之谜，作者走访了温州的决策者，他们是用什么魔力来搅动这块土地的。当然他们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虽然是主要决策者，但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因为任何一个生命的个体，都不可抗拒地被历史烙上生存时代的印记，在他的血脉里流淌着，其实这就是那个时代最为本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同时，也正是那样的政治、那样的经济、那样的文化，才塑造出了那样时代的真实的人。

温州模式的奠基人

——访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原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



[采访背景]

袁芳烈，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后来为中共中央十二届候补委员，他当时是省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1981年8月6日他肩负省委重托,为解决温州领导班子问题,并以温州地市合并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到温州工作。温州新市委建立后，他

兼任第一书记，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他大刀阔斧，满腔热情地扶植老百姓发展经济，为“八大王”平反，召开“两户代表会”，为“企业松绑”，整顿社会秩序，形成了“温州冲击波”“东方起动点”。2000年西部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召开。我有幸与他一起参加会议，事后又和张连杰主编共同采访了他，他在温州的业绩人民是难以忘怀的。

问 听温州老百姓说：您在温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在解放思想，冲破阻力，发动老百姓发展经济方面作了许多实际工作；“两会一平”影响最大，你能否细谈一下。

袁芳烈：（他很激动而且很兴奋）是的，所谓“两会”就是指1982年12月16日召开的全市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会议和1983年8月召开的城市工业企业松绑大会 所谓“一平”即1982年初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时，在温州市柳市镇抓了“八大王”，作为投机倒把犯罪判刑7个，1个逃跑，市委、市府经过调查研究通过法律程序给予平反。

（袁书记喝了一口茶，推一推眼镜，边回忆，边说）：

来到温州之后，我们选调干部组织几次调查研究，认为温州底子薄，土地少，缺少大型企业，国家投资不多，但有大量的能工能商的能人和经商传统，可以发展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工商副业，发展商品生产，是一条可以致富的捷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温州广大农村开始涌现了一批冲破阻力，敢于冒富的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代表人物，当时称之为“重点户”“专业户”，实际上是个体户。市委决定召开全市“两户”会议，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树立典型，以推动全市改革和经济发展。但通知发出后，有的区乡干部不敢通知专业户、重点户，怕以后追查责任；那些确定参加会议的“两户”代表接到通知也不敢来，害怕是不是说我富了，在会上把我抓起来？有的带了许多衣物来，准备进“学习班”甚至坐牢。市委针对这种情况，认为根子是人们头脑中的“左”的思想，影响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百姓想富怕冒富，想富不敢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必须抓典型，树榜样，以点带面。因此，市里从基层开始层层选拔，给“两户”代表挂上大红花，上主席台，敲锣打鼓，大张旗鼓地欢送，市里组织欢迎，机关、商店、大街上挂上了欢迎的巨幅标语。1982 年 12 月 16 日，温州市有 1200 多名代表参加“两户”代表会，我作了题为《专业户、重点户是当前我国农村的新生事物》的报告，充分肯定“两户”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积极作用，市委制订了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 10 个方面的政策措施。随即，各区县、各乡镇都仿照市委的做法，层层召开“两户”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一下子推开了，全市城乡形成了一种发展家庭工商业合法光荣的浓厚气氛。

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基础上，又召开城市工业“松绑”大会，主题是清除“左”的影响，为企业松绑，会上提出了大力发展家庭工业和街道工业，制定了发展城市经济的十项政策。这两个大会都将市委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直接和群众见面，“一竿子到底”反复贯彻，从而使温州的经济发展掀起了高潮。

问 那么，为什么要平反“八大王”

袁芳烈 所谓“八大王”，指的是乐清柳市镇“八个个体户”，即“邮电大王”是指民办短途邮电的；“目录大王”是指广告信息的；“旧货大王”是旧货购销加工的；“机电大王”是低压电器购销的；……1982 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时，作投机倒把犯抓起来的，他们中 7 个判了刑，1 个逃奔天涯，通缉令发到了全国。所以，温州老百姓发展商品生产心有余悸，说“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怕变、怕露富、怕做大、怕冒尖、怕像过去那样给戴上“暴发户”“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等等的帽子，被批斗打击。1984 年来了中央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提倡要搞活流通。恰在此时，《海霞》的故乡洞头县出了个“虾米案”，一些农民把渔村的虾米收购起来运到外地，被当作“投机倒把”要打击。市委发现此事马上制止纠正了，但常委们想起了还关在狱中的“八大王”，其中

“机电大王”刚刚通缉归案,已关了两个月。大家在讨论时认为,要贯彻好,落实好党中央 1984 年一号文件,首先必须解决“八大王”问题,否则说干道万老百姓也不相信你。常委们边学习、边讨论,越来越觉得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对搞活流通,发展商品经济怎样看的问题,在“左”的目光下到处是投机倒把,洪水猛兽。用唯实的眼光看这八个人是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农村的希望,是农民的榜样,这个案子非平反不可。

因此,由市政法委牵头,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全案进行复查,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上符合中央精神,由于界线不清,把他们作为经济犯罪判了刑。指导思想一变,许多“非法所得”变成合法收入,法院合议庭经过多次争论认为:“八大王”案应该立即平反,无罪释放。

市委当晚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在传达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精神之后,市委郑重宣布:轰动一时的“八大王”案子经过公检法机关的慎重复议,认为他们搞活流通,发展经济没有错,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是一宗错案。宣布为“八大王”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将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市委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勇于清“左”,坚持务实,敢于创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带领老百姓大胆发展商品经济,让党的富民政策在温州大地开花结果。

全市电话会议和“八大王”的平反,作为头条新闻在温州城乡传开,基层干部胆子大了,心有余悸的群众放开手脚大干。温州城乡的活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商业大军的大调整在温州农村开始了。到 1985 年,全市已有 80 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经营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家庭工业企业达 13.3 万家,主要分布在平原、沿海农村,同年全市农村

工农业总产值 25.5 亿元,其中农业仅占 25% ,家庭工商业收入占 65.5%。农村经济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变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村家庭工业为支柱。温州农民迅速致富的捷径果然找到了。

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

问 袁书记,听说柳市的南存辉就是‘八大王’平反之后才壮大起来的?

袁芳烈 是的,小南当时是补鞋子的,挣了一些钱后,小打小闹搞了个小作坊,柳市‘八大王’平反之后,他们俩兄弟,南存辉、南存飞和胡成中、胡成国俩兄弟才敢做大,于 1984 年正式申请办的厂。从 1984 年 7 月份开始,历经了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和集团经济,如今成为中国的‘大哥大”,正泰企业的南存辉成为“中国 50 富”之一。

(上午一谈已是 11:45 分了,采访暂告一段落,第二天上午我们继续采访袁芳烈同志)

问:昨天上午你谈了在经济领域中采取了非常的行动,打开了坚冰,拓开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航道,那么,在社会环境的治理方面有什么相应的措施?

袁芳烈:社会环境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安定、良好的社会秩序,老百姓发展经济就难以安心。

(袁芳烈同志回忆起 1983 年发生的一件三轮车夫打人事件)

那是 1983 年 5 月的一天下午,我到一个工厂检查工作,车到汽车西站,看见有一大群人围在一起,一个女青年披头散发地在叫“救命”。我叫司机停下车。不远处,几个小流氓正在用一根铁链锁抽打一个男青年,被打得休克,躺在地上。

我早就听说,一些三轮车工人勒索钱财,殴打顾客,晚上聚在一起大吃大喝,还互相交流“杀了几头肥猪”。没想到今天碰上了,当即责令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打人的凶手扭送公安机关,把被害人送到医院。一到工厂办公室我马上就给公安局挂电话:一、马上

组织对受害者的抢救治疗 二、马上把另外的凶手查捕归案 三、一定要严肃处理凶手。第二天下午，市委召开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城区领导参加的会议。把两个受害人接到会议室，先让大家听他们的叙述。他们是来自哈尔滨的一对年轻夫妇，到温州采购手套的，在火车上听人说到温州千万别坐三轮车。于是他们到了温州西站下了汽车准备步行时，谁知一下车，手上的包袋被拉三轮车的抡上了三轮车非让坐车不可。在推让中，一个人拿走了男青年的眼镜，扔到马路对面,他气愤中说了一句‘ 温州人怎么这样不讲理 ！”鼻梁上挨了一拳。随即围上来一群人拳打脚踢，有一个解下了铁链锁狠狠地抽了过来。女青年吓坏了，苦苦哀求，但他们一直把他打得休克了还不罢休。

到会的同志沉默了。温州的社会秩序之乱，使他们抬不起头来。他们都知道三轮车队的那些令人发指的事，但这样身临其境的听诉述，还是第一次。三轮车队里有好些混世魔王，他们 60％的人是劳改过的人员，街道无法安置就业，就让他们自寻生路，对他们放松管理

当时我很内疚，我说：“ 我这个市委书记没当好。我对不起你们,我向你们道歉。请相信,我们会作出公正处理的。’送走客人。市委决定把全市 425 辆三轮车立即进行了停业整顿。另一名主犯被公安机关迅速抓获。当时正在开人代会，市委要求当时三个区的区长每天 9 时以后,向市委汇报整顿情况,步步抓紧,毫不放松。公安机关及时依法宣布对两名凶手逮捕法办，全体三轮车工人分组展开了大讨论。一个街道一个街道地进行登记清理。管理部门制定了一整套管理细则，每辆三轮车都编了号，设立了监督电话，明确规定价格,提倡优良服务。

问：有些地方一见到农民出点问题就一棍子把他打死，把农民扼杀在商品经济的摇篮之中，而温州是如何保护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能讲些具体例子吗？

袁芳烈沉思了一会说：温州有个金乡镇，是做徽章、标牌、塑片、证件出名的专业产销基地，他们信息很灵通、业务网络遍布全国。我记得我国决定实行居民身份证后，这个镇立即有人设计出来居民身份证的样本，寄到有关部门联系订货，上级公安部门要求把此事作为伪造证件的严重违法行为加以打击，我们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打电话给上级公安机关商量，认为老百姓主要为做生意赚点钱没有别的目的，说明此不经公安机关许可不能随着制作的，停止则可。应与有意伪造区别开来，采取教育的办法为好。上级公安机关同意了，从而保护了金乡镇群众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

问 听说，柳市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

袁芳烈：乐清市柳市是温州有名的小五金、低压电器产销基地，当时有一万多个家庭工业户，年产值达 1.7 亿元，有的企业因搞不到白银，就用白铜代替接触片，降低了产品质量。为此，有关工业部门曾发出通报，禁止购买柳市的低压电器产品，并限令停止生产，温州市委、市府闻讯，立即派工作组和技术人员帮助柳市的家庭工业户整顿和提高产品质量，并由市里投资兴办一个电器产品测试中心，统一检测外销产品质量，并选择技术力量较强的乡镇企业为“龙头工厂”，对家庭工业户进行技术服务，严格把好质量关。

（在采访时、正好温州一批企业家参加西部论坛，我们同时邀请了他(她)们座谈，其中一位是温州巨一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李爱莲同志，讲到袁芳烈同志为支持街道发展工业，她特别激动。）

问 请李董说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故事。

李爱莲 我们那个破厂，只有 100 平方的角落屋。大家干着，没工资发。三中全会后，改革，把我给改上了。我也不怕丢丑，有能耐，挣饭吃，没能耐我自己滚蛋。第一年下来，产值从 4 万元上升到 30 万元，1982 年 56 万元，1983 年 60 多万元。我采取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年终分红也挂钩分配措施。我搞市场开发，全国跑，街道小厂苦哇，人家看不上你的鞋。第一年退回了 23 双，我全给换了新的。

第二年江西退了 200 双,我气得流了泪。没说的,这批货是做工质量问题,全厂职工赔,连烧饭的老太婆也要赔。姐妹们说:“老太婆算了”。我说我不管,奖金她也照拿,厂倒了,她不也照样没工资发?这个厂是谁的?还不是大家的?厂里要 6.5 万元造新厂房,我黑板上一写,每个职工集资 200 元,自愿。都主动送来了,有 3 个没交,我也算了,因为他结婚还借人家钱呢!我说到做到,当年挣来了还工人,还加奖金。设备好了,厂房、门市部有了,向阳皮鞋厂露了脸,想不到 1983 年对我们街道企业也来了那个奖金税!我在电话里就跟财税局的人吵起来了。我辛辛苦苦地在那破房子里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的抠来,帮你安排了 200 来号人就业,我搞计件工资,一天干 10 多个小时,下雪天怕迟到,我把 7 时半上班提前到 7 时,看谁还迟到!姐妹们气得骂我,家里的饭碗都来不及洗,一个月只休息一两天,我拼死拼活地干,你从来不过问,我赚那 200 元一月,你就来那个奖金税!你看到我们那艰难了吗?他说他不管那些,我说你不管这些,就管收税 我把厂关了,你一分也收不到。他说 你去告吧,我今天发票不给你了。不给发票,我产品怎么卖,这不是要我死吗?要我关门吗?我就真告了。向谁告?我就想到袁书记,因为在温州他最大。可以管你那收税的。我就不信天塌下来。我说我们厂里关门了,我们街道工厂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红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我想这种信也许石沉大海,他大书记会管吗?谁知第二天市委办公室打电话找我李爱莲,请了我们五个厂长,都是那敲敲打打搞小玩艺儿的,我们是搞计件工资制的,每月计件工资 200 余元,说我们工人收入太高了,要收那奖金税的。我按件计酬多劳多得,没有奖金。袁书记主持会议,财税局、劳动局、工商局、二轻局、银行的头头们都来了,他叫我说,我就说,把那苦水倒了空。说完,我眼巴巴地瞪着他们,还收不收我们这些街道小厂的奖金税?姐妹们等我这句话哪。要收奖金税,我还加班加点干什么 不会回家搂孩子睡觉去!我不像你那国营厂,收入低了人才就会跑到别的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去,我搞不好厂,你就会说我骗子,抓我,职工会找我算账,可国营工厂亏上几百万，屁股一抹换个地方当他的官。第二天温州日报登了，说要给街道工业松绑，说主要是为了安排待业人员出路的街道工厂要扶持，奖金税也不交了。1983 年我承包,有人劝我别干,全城里只有我一个包了。第一年利润 9 万元,我得奖金 3000 元,还选了市劳模。有人说当了劳模就不能拿那 3000 元,这事让袁书记知道了,他说:"为什么不能拿,现在就是要越劳越富,劳动模范不富，难道让懒汉捣蛋的去富？"真是不打不相识，财税局的同志见面就笑着说 李爱莲,太阳出来了。是的,太阳出来了,1984 年我们厂产值 165 万元,利润 23 万元,我奖金 1.1 万元。1985 年,我给他来了产值 220 万元,利润 30 万元,向阳皮鞋厂打出了牌子。你们买不买皮鞋 我们那质量,嗨,你们见了保证喜欢！(回到温州她真的派人送来了两双皮鞋)

袁芳烈(深有体会地说)温州市的领导干部认为要发展商品经济,环境十分重要,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为老百姓创造发展环境的条件;"领导"两个字讲得少;"引导"两个字讲得多;"服务"两个字用得多，老百姓是政府工作的第一目标，在发展商品经济中，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认识和加强农民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折过程，少一些生硬的行政命令，少一些当领导的架子，多一点实事求是，对新问题不要动不动就简单地否定、打击、取缔,而应多从正面引导积极提高,千万不能倒脏水把小孩子都倒出去。

问 你和你领导的一班人,我们感到 一切从温州实际出发，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真不容易呀！

袁芳烈 实事求是大家都会讲,但真正做起来就很不容易。有一次我到当年当县委书记的衢县过年时，顺便去了当年曾蹲点的南垅村,我调走后,有 20 年没到过这村了。这里老百姓很热情、亲切,有上百人老老少少围拢来说长道短,说电灯是我在蹲点时装上

的，抽水机埠是我蹲点建的等等，我说你们都摆我的功，我还有很多缺点,错误怎么不说呀 ?他们说我没有错误,我说人无完人,我也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如割你们的‘尾巴’?他们说那是上边的精神，我说对的，是上边的精神，但我是是县委书记，如果当时有觉悟不割也行。那些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大家没饭吃,对不起大家，教训深刻呀 到温州工作不割老百姓的‘尾巴’了,而是帮助老百姓长‘尾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逐渐活跃，温州农村出现了三个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营家庭工商业后，承包的土地不再自己耕种,而转包给别人,每亩要收 200 余斤粮食作口粮和农业税,而 1983 年中央有关文件明文规定不得转让土地；收取地租这是剥削，绝对不允许；多数家庭工业的产品依靠购销员用转让合同的途径推销出去，而当时的上级文件规定，转让合同是不允许的，犯投机倒把罪；为了方便同外省市的产销联系，家庭工商业户挂靠到当地某工厂国营或集体企业，以其名义与外省市进行业务活动,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有关条例,这种做法,也是不允许的。温州市委、市政府经过调查研究后感到，农村劳动力过剩，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搞家庭工商业，有利于农民尽快脱贫致富，转包土地后收取部分粮食，实际上收的是议价与平价之间的差价，应当允许；合同转让和“挂户”，关系到家庭工业产品的出路问题，没有这两条,流通就搞不活,生产就发展不起来。因此,不应打击或取缔,相反,应予保护。后来中共中央 1984 年 1 号文件,根据农村形势的新发展,肯定了温州的做法,改变了 1983 年有关文件的规定，明确提出土地可以转包，农民购销员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关部门也承认了‘挂户’的必要性。实践证明,温州市委、市政府这种从实际出发的认识是正确的，有力地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基层干部反映，这不是对抗中央精神，而是坚决地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中央的精神和

当地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的贯彻了中央的精神,是‘寻找最佳结合点”。

问:你认为温州为什么有今天,有什么体会?

袁芳烈:温州的发展之路,决不是领导和政府的随心所欲。它是从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我经常说,无论谁到温州去当领导,不走此路是别无出路的。

共产党最讲群众路线。温州的发展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真正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经济发展的权力还给人民,经济发展前途才会灿烂光明。群众的创造性要靠正确的政策去激发和引导,而决不能去压制和打击。

温州的发展之路决不是我袁芳烈或别的领导的发明,也不是政府的创造,它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群众既是温州模式的缔造者,也始终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原动力。是温州的农民从泥田里爬上岸,去从事工商业,是群众自筹资金、自担风险经商办企业;是群众使温州的小商品走向全国的大市场;是群众创造了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形式;是群众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龙港镇;……温州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从群众中而来,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主要是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群众创造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东西转化为确定的政策,再推广落实到群众中去,不支持或不敢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温州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说到温州的发展,我认为还要强调一点,那就是事物发展的阶段化问题——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经历这个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过去有段时间,一提到温州就让人联想到‘假冒骗’问题,温州货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影响很大,这也成为有人否定温州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理由。温州当年有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呢?确实有。但应该怎样来看

待这个问题？是因为出现了此类现象，而将这些企业一棍子打死，还是通过规范管理来帮助他们提高呢？我经常说，当年农民从泥田里爬上岸搞工商业，脚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你能要求他们一下子搞出多高质量的产品？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有一个从无序自发，走向有序自觉的过程。但对于这种大有前途的新生事物，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去扶持它，为他们解决困难，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提高质量，规范管理，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80 年代初，国家曾有几个部委联合先后以产品质量不好为由，禁止销售温州柳市生产的低压电器产品，派工作组要把柳市这个低压电器生产基地打掉。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管理和引导解决,一打了之,看似痛快,实则严重损伤了生产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今天的温州‘ 商业信用被大力推崇,行业自律日渐强化,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事实证明 通过政府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自身的调节力量，温州这种自发自主的商品生产与经营行为可以形成良好的经济规范与信用关系。现在的柳市镇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占据全国三分之一的市场，拥有多个知名品牌，许多产品的质量通过国际认证，如正泰、德力西集团从当年的一个小作坊发展成现在销售额 40 多亿元的大集团。如果当年采取了打击政策，后果不堪设想。

问：袁书记，您在温州不长的四年时间，带领大家干了有目共睹的业绩，结果，回到省里变成了括弧——享受副省级，您怎么看？

袁芳烈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这是分工的不同。对党和事业的奉献不是以职务高低来论的。 1986 年我回到省里管政法工作，是常委政法委书记,1988 年省委换届，我因年令关系要退出省委常委，当时组织上提出省人大、政协、省高院三个单位征求我的意见，是我自己要到省高级法院工作的。当然由于人们对温州这种经济格局的不认识，姓资姓社的争论的影响，所以，有些事情是难以说清的。但我自己心里很踏实，温州老百姓没有忘记我。

问：温州发展的路子，对西部开发有何作用？

袁芳烈：我觉得温州经验对中国特别对西部尤为重要。西部大开发坚持高起点，防止重复建设的方针是必要的，但不可能所有的建设都是高起点，产品都是高科技，广大群众有一个积累资金和逐步提高素质的过程，产品和服务的档次与质量也必然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个阶段是不可跨越的，我觉得西部对这个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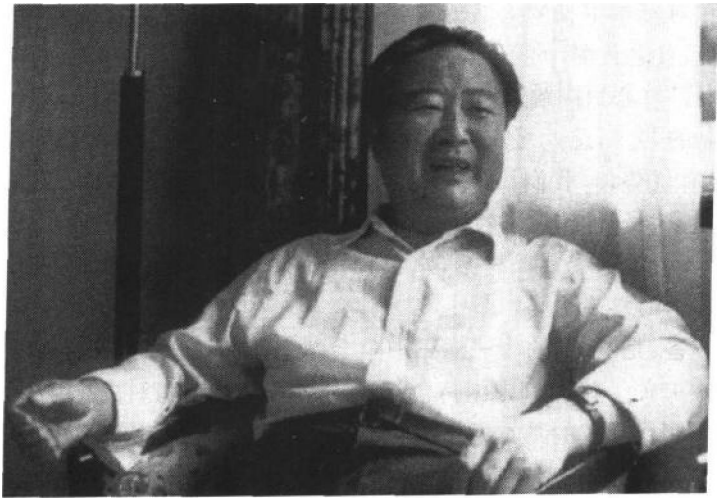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因时适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与发展，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对于增进民族团结、稳定社会，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我对西部大开发没有专门研究，但从自己在温州的实践看，我认为还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当然这其中的内涵由于时代与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解放思想不能只是口号，要落到实处，不是光要群众解放思想，而是首先要求领导干部解放思想。不要怕别人来开发挣钱，不挣钱，没有利益，谁到你这里来投资，人家来投资办厂，你可以收税，又可以解决就业，何乐而不为？对企业应“只求所在，不求所有”，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一时有利，终久无利，小局有利，大局无利的作法，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西部的地理环境与历史传统千差万别，经济发展参差不齐，民族问题敏感复杂，一切从实际出发显得尤为重要，要走出自有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西部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需要中央专门的优惠政策，但关键是要激发内部活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发展经济的主动权还给人民群众。我坚信，只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政策对头，西部大开发一定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

（李丁富）

我的帽子放在办公桌上

——访风风雨雨中的原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



「采访背景」

温州模式现在被人们共认了，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范。但当年，特别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前，温州走的路是对是错，是‘社’是‘资’,人们争论不休,作为温州市当时的领导承受的压力就更大了。那么,他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为此,我采访了生病住院的董朝才同志，他是其中一位。

问：您从金华到温州工作，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答：我们金华地处浙西、集体经济比较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但到了温州，实践教育了我，温州走的路子很对。我是一个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